

# 鄧穎超與「跑得快」

● 武佩琴（台北市京華獅子會創會人）

## 結識鄧穎超的因緣

我是山西太原人，早年家裡經營礦業銀樓生意，家庭富裕，生活無虞。「七·七」蘆溝橋事變，中日大戰爆發時，家鄉受到戰火的襲擊，我正在太原讀書，無法回家，祇好和老師同學們一起逃難，成了流亡學生。幾經生死險境，身無分文到了當時的後方西安，留在西安考入國民政府軍委會的「戰幹」第四團，統編後成為黃埔軍校第十六期的學生。畢業後，因為是女生便被分派到當時的難民兒童院服務，正式名稱是戰時兒童第二保育院，成了難民小學的校長。我是個不怕苦，愛找事做的人，每天幫孩子們洗澡、剪頭髮、做衣服，東奔西跑為孩子們籌募衣、食、住的物質及場所，被大家推派為婦女代表，每過一陣子就要到重慶開會。因為這一因緣結識了鄧穎超鄧大姐和她的夫婿周恩來先生。

有一年，我自西安搭「中央銀行」的運鈔車護送幾個孩子到成都第三保育院，再到重慶開會，住在重慶市曾家岩五十號一位王大姐家。我們住在二樓，鄧穎超和周恩來就住在三樓。那時候我剛二十歲出頭，只曉得周先生和鄧大姐是很重要的人物。由於是住樓上樓下，我又年輕，喜歡跑動，很快就與周恩來和鄧穎超熟悉起來。他們待我很親切。我看他們太忙，也樂意在生活上為他們幫些小忙，順便為他們買買東西，幫鄧穎超做做針線。鄧大姐是非常節儉刻苦的人，周恩來不在家的時候，她就要我替她買兩個饅頭，蘸點辣椒、芝麻醬當飯吃。如果周恩來公出來，大姐會托我代買兩個雞蛋，算是給周恩來增加些營養，這些都是她平時捨不得吃的。有時候家裡來了客人，我就主動幫助張羅，先上樓去數數人頭，然後拿口鍋飛快的跑下樓，去幾條街外的一家有名的館子——冠生園，買些在當時算是美味佳餚的蛋炒飯給客人們吃。有時候我幫鄧大姐補補衣服、釘釘扣子。如果她自己釘扣子，一件衣服可能會釘上五顏六色新舊不同的扣子，她說：「扣子是用的，又不是看的。」我知道她這是為了節省。她和周恩來那時候住的和用的都非常簡陋，客人一多，連椅子都不夠用，我就從二樓搬幾把椅子上三樓。

## 待人仁厚體貼入微

周恩來和鄧穎超非常體貼他人，到他家的客人有時會直呼我的名字武佩琴。那時候，未出閣的女孩子是不能直呼姓名的，於是，

周恩來和鄧大姐風趣地叫我：「跑得快」。因為我總是跑上跑下閑不住。久而久之，所有到他家的客人都這樣親切地叫我。

當我快離開重慶回西安的前幾天，大姐拿了封信叫我送到當時的賑濟委員會第三處處長馮玉祥的秘書余心清那裡。過了兩天就來了封公函，任命我為賑濟委員兼西北特派員。我深知這一定是鄧大姐、周恩來擔心我回西安後生活無著，無力照顧兒童，托有關方面給我做了這樣的安排。我這一生，從沒請人介紹過工作，鄧大姐夫婦卻是唯一給我介紹工作的人。我有了這個職銜，當時無論到任何的政府機關，都會給我糧餉，每月三代麵。我真是喜出望外，這三代麵在當時非常的珍貴，能救助很多食不果腹的兒童們。回到西安後，我先後到好幾個部門「上班」，每個月領到一份糧餉——三袋麵，全部送到保育院，作為孩子們的口糧。為感念鄧大姐、周恩來待人仁厚，對戰時兒童呵護備至，我也更加積極地為維持保育院的生計東奔西忙，連保育院附近的商家、部隊對我都很熟識，他們一見我就開玩笑地說：「叫化子頭，又來討飯了。」他們全是有求必應。如今，當年保育院的孩子們早已長大成人，大都很有成就，成為國家的棟樑。

一九九一年夏天，我隨台灣一個婦女團體回大陸訪問。我自一九四八年離開大陸，一別就是四十多年。故國重遊，感覺一切都很親切。往事如煙，不覺憶起與鄧穎超夫婦在重慶朝夕相處的難忘歲月，觸動我拜訪鄧大姐的想法。我向接待我們的姊妹表達了我的意願，很快就得到答復，她還特意派車把我接到中南海西花廳她的寓所。

見到鄧大姐，她除老了許多以外，什麼都沒變，待人還是那樣和藹親切，衣著樸素到極點。她一見我便問：「你結婚沒有，有幾個小孩？」在她的印象裡，我還是那個四五十年前，二十歲出頭的大姑娘。大姐向我同去看她的另一位台灣女士談的都是統一大事，而跟我談的都是陳年舊事，十分關心我的生活和親人。臨別時，她拉著我的手說：「為了紀念恩來，讓我再叫你三聲『跑得快、跑得快、跑得快』。」大姐連叫了我三聲，我連連答應著，彷彿又回到從前。

當時，我看鄧穎超家中陳設十分儉樸，決心下次再回大陸看她時，一定要買張電熱毯送她。不料，第二年（一九九二）夏天便聽到她不幸逝世的消息。難忘的往事，化作了無盡的懷思。

### 甜蜜回憶細說從前

回憶五十多年前在重慶，鄧大姐的夫婿周恩來公出時，她要我陪她閒談，她曾告訴我她和周恩來相愛的經過。周恩來和她的中學時代，都是在天津渡過的。她在直隸女子師範讀書，周恩來在南開中學，那時男女分校，風氣閉塞，男女授受不親，大家沒有接觸的機會。周恩來比她大六歲，她上中學時，周恩來已到日本留學去了。周恩來少年英俊，能言善道，在青年學生群中，知名度很高，她時常聽到同學們講起周恩來的名字，到了五四時才和周恩來相知相識。周恩來一九一九年四月從日本回到天津，參加五四愛國運動，她在六月間的一次群眾大會中，看見一個青年穿著藍布長衫，白色膠鞋，頭戴鴨舌帽，英俊瀟灑地站在主席台上，台下有人指指點點的說：「那個穿藍布衫，白球鞋的小伙子就叫周恩來。」這一說立刻引起女同學們一陣細聲的議論。鄧穎超說：「我這才認識周恩來就是他，後來我們一起開會，辦刊物、組織覺悟社，兩人接觸的機會漸漸多起來，彼此都有好感！這種好感，兩人都深藏在心中，誰也沒有表露過。直到我們結婚之後，他才談起第一次和我相見的印象。他說：某次在天津開會，首先站起來講話的是位一雙大眼睛最

引人注意的女孩子。可見我的一雙眼睛在他年輕的內心深處早已留下深刻印象。」

鄧穎超又說：「恩來和我都是覺悟社社員，彼此接觸頻繁，恩來在學聯會編聯合會報，我任學生會演講隊長。恩來跟別人談話很多，話很長，我那時是少女，恩來對我講話較少，話說得很短。當時我們許多學生相約，不戀愛、不結婚，全心投入改造社會工作，避免自己受累更增加愛人的麻煩。覺悟社內曾有二十多人，宣布抱獨身主義，恩來是其中之一，也曾為此發表文章。我對婚姻的看法不甚固定，結婚的事，無可無不可，後來我覺得，一個人獨身生活，太孤獨，雖然我有兩個很好的女朋友，但不等於終身伴侶。到了一九二一年時，我認為男女應該結婚，婚姻應自主，找的對象必須志同道合，條件相當，在我的心目中，周恩來就是我最理想的終身伴侶。那時我年紀還小，對『愛』的真諦還不甚瞭解。一九二〇年恩來赴法留學期間，我們一直都有書信來往，一九二三年周恩來在一封來信中，首次向我表露愛慕之情，我因年紀還輕，況且恩來當時在法國有位相交很深的女朋友。對他的來信，我並未放在心上，直到恩來接二連三地來信，要我面對問題時，我才仔細考慮，同時取得母親的同意，給了他肯定的答復。我和恩來結婚時非常簡單，沒有舉行任何儀式。婚後，我們約定不在同一個單位工作，以維持夫妻良好的關係。在半個多世紀婚姻生活中，我們一直保持著戰友情誼，過著恩愛的家庭生活。」

## 推動兒童保育工作

鄧大姐在抗戰時期對於組織婦女，推動兒童保育工作，是很有貢獻的。她和夫婿周恩來談妥，要周恩來到馮玉祥家商請馮夫人李德全出來主持戰時兒童保育工作，立即獲得李德全的贊同。

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一月鄧穎超、李德全、沈鈞儒、郭沫若、蔡元培等召開發起人會議，有一百八十多位名流參加，決議成立戰時兒童保育會籌備會，為取得國民政府社會部批准立案，鄧穎超和李德全研商由李德全邀請蔣中正夫人宋美齡女士出面主持成立大會，並請求宋美齡將保育會作為中國婦女慰勞抗戰將士總會的直屬單位（宋係慰勞總會會長），宋美齡同意出席主持大會。鄧穎超出席大會時，見各界名流七百多人到會，盛況空前，充分表現各界團結抗日的熱烈情況。雍容華貴穿著黑色絲絨旗袍蒞會主持大會的宋美齡親切的和鄧穎超握手歡敘，期望國共真誠合作，全力搶救難童，將難童培養成建國的人才。

戰時兒童保育總會成立後，聘請蔣中正、林森、孔祥熙、孫科、宋子文、李宗仁、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葉挺、葉劍英、鄧穎超、康克清、蔡元培、郭沫若、沈鈞儒、胡適、晏陽初、陳嘉庚、胡文虎、斯諾、史沫特萊、司徒雷登等中外名士二百八十多人擔任名譽理事。宋美齡任理事長，李德全任副理事長，鄧穎超任常務理事。

## 對宋美齡非常崇敬

由於宋美齡女士的聲望，使得情治人員對婦女慰勞總會的勞軍活動以及兒童保育會的活動，不僅未加限制或干擾，還順利的得到各界的協助支援。保育會成立後，隨即邀請各地知名婦女成立保育分會，短期內就有廣東、江西、浙江、安徽、廣西、貴州、湖南、成都、陝甘寧邊區等地成立了分會，香港及南洋群島也紛紛成立分會。在後方更成立了很多兒童保育院，大量收容搶救了數萬名的難

